

外来打工妹的择偶意愿研究

叶文振¹, 胡峻岭¹, 叶妍², 陈娜²

(1 福建金融职业技术学院, 福建 福州 350007; 2 厦门大学, 福建 厦门 361005)

摘要: 利用抽样问卷调查资料, 描述和发现外来打工妹的择偶意愿及其主要特点, 并通过多元回归估计, 检验所提出理论假设。实证结果基本上支持外来打工妹择偶意愿的再社会化理论和边缘化理论。

关键词: 外来打工妹; 择偶意愿; 回归分析

中图分类号: C91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4346(2006)06-0032-09

Study on the Mate-selection Intention of the "Floating" Girls

YIE Wen-zhen¹, HU Jun-ling¹, YIE Yan², CHEN Na²

(1 Fujian College of Financial Technology, Fuzhou 350007, China; 2 Xiamen University, Xiamen 361005, China)

Abstract Using the data from a questionnaire sampling survey, the present paper describes the mate-selection intention and its major characteristics of the "floating" girls and conducts a statistical test of the theoretical hypothesis through a regression analysis. The results support the re-socialization and marginalization theories of the "floating" girls' mate-selection intention.

Key words the "floating" girls; mate-selection intention; regression analysis

在改革开放中形成、并不断扩大的人口流动是我国这些年来人口社会变动中的一道最为亮丽的风景线。在这一风景线中, 源源不断地流向城市的外来打工妹则是最为引人注目的景点。人们首先关注的是她们的规模、扩大的速度、流动的线路、域界的分布以及她们流动的原因, 紧接着人们把注意力转向对这些年轻女性生育选择的描述和评价, 甚至认为她们的流动是对计划生育政策实施的一大挑战。随后, 人们才把视野投放到关于城乡流动对她们生活方式特别是婚恋方式的影响上。虽然这种关注的拓展也是一种进步, 甚至是包涵着对外来打工妹更多的理解和尊重, 但我们的许多研究和评价还是单一学科的、非客观的和不全面的, 不论是学界还是政府的管理部门都期待着有更为科学深入的研究。

本研究首先回顾和评价已有的文献, 在此基础上提出我们关于外来妹择偶意愿的理论解释框架; 其次是介绍本研究的资料来源、样本的主要特征、变量的测量和处理以及分析方法的选用; 第三是运用问卷调查获得的第一手资料描述外来妹的择偶意愿, 发现所存在的主要特点; 第四是对前面提出的理论假设进行实证检验和讨论; 最后是利用影响因素分析的结果有针对性地展开对策思考。

收稿日期: 2006-07-27

作者简介: 叶文振(1955-), 男, 社会学博士, 福建金融职业技术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1 文献综述和理论框架

1.1 西方研究

以流迁人口婚姻家庭行为为研究对象的西方学术成果十分丰富多彩,形成了以人口学、社会学、社会心理学和经济学为分析视野的许多理论解释,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包括:

(1)人口结构理论(Cuttentag M. and P. Secord 1983),认为外来务工者的婚姻家庭行为是本群体人口规模、适婚人口性别比和居住分布密度等变量的共同函数,来自同一个迁出地的人口越多,性别比越均衡以及居住越集中,同乡婚配就越多,婚姻稳定性就越高。

(2)结构同化理论(Stephen and Bean 1992),认为外来人口与当地居民在社会经济方面的趋同必将逐步消除二者在婚姻家庭意识和行为模式上的差异。

(3)亚文化假说(Swicegood et al, 1988),认为外来务工者的婚姻家庭实践取决于他们对原有文化价值的保持程度。

(4)社会地位分析(Halli 1987),认为外来务工者的外来身份以及由此而生的边缘感觉和不安全感,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他们的婚姻家庭生活安排,与当地居民对比,他们的个人发展具有更大的婚姻家庭代价。

(5)交换理论(Strong and DeVault 1986),认为婚姻家庭是当事人各自所拥有的资源理性交换的结果,异地创业的不稳定性和压力强化了外来人口的婚姻交换意识,促成了婚姻市场上许多社会经济长处和非社会经济优点相交换而形成的婚配。

(6)选择理论(Kahn 1988),认为流出人口大部分具有同质性,即文化程度相对比较高,并具有强烈的发展愿望和对都市现代生活的追求,流入后都会主动地推迟结婚和控制生育规模。

1.2 我国研究

根据文献检索,我们发现中国学者近年来也从人口流迁的过程和原因分析转向对流动人口婚姻家庭生活的研究,已经形成一定的科研产出。这些研究成果有根据中国社科院人口所于1986年组织的16省市迁移调查结果,对迁移与生育率关系的分析(谭晓青,1990);2002年国家计生委举行的“全国婚配观念和生育意愿”调查(潘贵玉,2003);2005年中国社科院人口所组织的“流动人口的婚姻家庭和生殖健康问题研究”(张翼,2005);用人口学方法分别对上海、浙江、江苏、广东等地迁入女性和打工妹婚育观念和行为的研究(彭希哲等,2003;徐爱光等,1992;黄润龙等,2000;陈印陶,1997);从社会学、人口学角度对北京外来女婚姻模式、家庭类型的分析,对安徽、四川外出打工女性婚姻生育观念行为变迁的解释,对厦门流入人口择偶观念和行为的探讨,以及对深圳已婚流动人口婚姻家庭状况的调查研究(林富得等,1998;宋国臣等,1999;郑真真,2002、2003;叶妍、叶文振,2005;迟书君,2005);以及从人类学视野对贵州外出打工对家庭和迁出迁入两地影响的研究(张继焦,2000)。

1.3 简单评价

以上简略文献回顾表明,学术界对于外来打工妹婚姻家庭问题的研究还是有限的。首先,西方学者的理论分析大都局限在国外,对我国外来打工妹的应用研究甚少。而且,由于文化和社会背景的显著差异,这些理论是否适用于解释打工妹的婚恋变迁还有待进一步的探讨。第二,尽管未婚打工妹在流动人口中占有相当的比重,她们进城后婚恋观念和行为的变迁具有重大的社会文化和制度的意义,我国学者却还没有给与足够的重视,专门的深入的研究还是不多。第三,相当一部分的国内研究都缺失系统的理论解释框架和停留在简单的统计描述和比较分析,假设检验式的量化研究相对比较少,而且还没有学者从性别的视角探讨外来打工妹婚姻家庭问题。第四,大多数研究是在某一个学科的范畴内进行,缺乏多学科的综合研究。第五,不少研究只侧重婚姻或家庭过程的某些侧面。最后,许多研究偏重于对外来打工妹的微观分析,较少从微观与宏观相结合的理论角度透视这一特殊群体的婚姻家庭行为。

鉴于此,我们有必要通过更为科学的研究范式 and 合理的理论框架,把对外来打工妹婚恋问题的研究引向深入,特别是在以下几个方面能有所突破:(1)使用专题的入户问卷调查资料,系统描述外来打工妹的婚育

观念、具体实践和行为特征,把现有的单性别侧面分析转化为双性别多侧面的比较研究。(2)提出一套融合多学科视角的关于外来打工妹婚姻家庭生活选择的理论解释框架,把侧重于描述分析的现有研究推进到更深层次的解释分析。(3)通过社会统计分析方法的应用,把过去比较一般化的定性讨论提升到更为严格的参数估计和模型检验,分析外来打工妹婚姻家庭选择的重要决定因素及其影响机制。

1.4 理论框架

我们将从四个角度透视所提出的研究问题。首先,比较分析的视角,这主要是外来打工妹与打工仔之间的性别比较分析。第二,多学科综合分析的视角。婚姻家庭是一个具有多学科性质的领域。以上的文献综述表明,各相关学科的研究既有重要的学科意义又显示出本学科的限制性,要克服现有研究存在的不足,还要加强各相关学科的交融。我们在突出人口学、社会学分析的同时,也考虑采用经济学、心理学等其他学科的理论与方法。第三,西学中用的视角。如上所述,西方学术界在流迁人口的婚姻家庭研究方面已有相当丰富的学术积累,我们将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有选择地把西方的相关理论应用于我国外来打工妹婚姻家庭选择的研究。第四,微观和宏观结合分析的视角。除了个人条件以外,流出流入地的文化社会经济环境也都会影响外来打工妹婚姻家庭生活的安排和稳定。我们在设计理论解释框架时把这些社区层面的影响因素结合起来。

根据以上的思考,我们提出一个关于外来打工妹择偶意愿的理论解释框架(见图1)。框架的右边是被解释变量或我们要分析的对象,即外来打工妹的择偶意愿。择偶意愿是当事人关于未来婚配的愿望或心愿,它包括择偶态度或动机,即要不要择偶和为什么择偶;择偶的时间,即什么时候择偶或考虑婚姻大事;择偶的标准,即择什么样的偶或择偶的条件偏好和要求;择偶的途径,即采取或通过什么方式择偶。我们认为,外来打工妹的择偶态度是关键性的、基本的,如果她们不想择偶,就谈不上其他的择偶考虑,如果择偶的目的不一样,那么择偶的标准、时间、甚至方式也会不同。但由于资料的限制,本研究暂时不考虑择偶意愿各个侧面之间的内在联系和互相影响。

框架的左边是三个层面的解释因素,体现我们的两个理论思考,一是外来打工妹择偶的再社会化理论,也就是外来打工妹进入城市务工实际上是经历一个再社会化的过程,结构性同化水平越高、外出人口的选择性特征越明显(如教育程度都相对比较高),外来打工妹与当地居民在婚姻家庭观念和和行为方面的趋同性就越强;相反,外来人口规模的扩大、居住集中程度的提高、以及外来亚文化的发展则减缓这种趋同的态势。外来打工妹择偶的再社会化理论是从正面理解外来打工妹的婚恋变化,它表明外来打工妹在城乡流动中逐步接受城市比较进步的婚恋方式,形成比较先进的择偶意愿。二是外来打工妹择偶的边缘性理论,即外来打工妹的边缘性、生存和发展的压力以及社会经济资源的缺乏会在一定程度上强化她们的交换意识,进而使她们的婚姻家庭生活选择具有相对比较大的经济实用性,其婚姻家庭关系也多了一份潜在的风险。因此,外来打工妹择偶的边缘性理论关注外来打工妹在城乡流动中凸现出来的婚恋问题,并指出这些问题产生的社会制度和文化的根源。

具体地说,影响外来打工妹择偶意愿的三个层面因素是:社会方面的因素,包括流动经历和地域文化;家庭方面的因素,包括父母的受教育程度;个人方面的因素,包括年龄、受教育程度、职业性质、收入以及恋爱经历等。它们和被解释变量之间的关系假设是(图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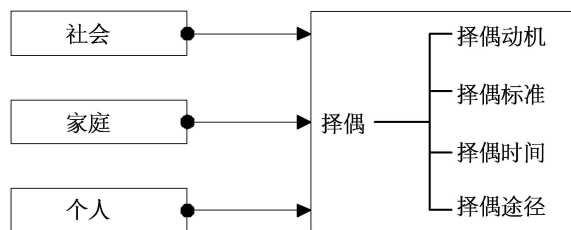


图1 外来打工妹择偶意愿的理论解释模型

(1)流动经历培育了外来打工妹在择偶方面的现代化取向。她们到城市以后,经过一段时间城市生活的潜移默化,会在思想观念、生活习惯等方面逐渐习得现代性,在城市生活的时间越长,这种现代性就会越明显,反映在婚恋方面,其择偶观念和行为也越趋向现代化。当然,这种再社会化程度还取决于她们的居住方

式和流出地地域文化的性质。住在城区还是住在城乡结合部或所谓的“浙江村”、“河南村”,有着十分明显的区别,她们与城市的主流文化、常住人口以及生活方式的交流和融合都呈现出不同的深度和广度。地域文化是指流出地关于婚恋等方面的意识形态,地域文化中有关择偶的观念越保守,流动人口的择偶意愿也会越传统。但是,流出地与流入地之间的空间距离也很重要,距离越远,交通的成本越高,回去的次数越低,对原来择偶文化的认同和回归也会越小。

(2)父母的文化程度与外来打工妹择偶的现代化程度呈正相关。父母的文化程度越高,其择偶观念就会越先进,在女儿流动前的共同生活中会通过直接或间接影响,使她们的择偶观念也越趋向现代性,而且高文化程度的父母在女儿流动以后,也会给与她们更多的择偶自主性,进而加快她们的择偶再社会化进程。

(3)个人背景也会影响外来打工妹对城市现代择偶观的接受程度。一般认为年纪越轻、文化程度和职业层次越高,越容易习得现代观念,其择偶期望也更趋向现代化。恋爱经历的影响主要表现为,有过初恋经历的人,对择偶的认识会更加理性化,如在择偶时间上,可能会认为理想的择偶年龄应该比自己的初恋年龄更大一些,这样不仅能够给与婚恋选择更为成熟的考虑,而且还有利于个人的成长和发展。但是,我们认为,这些一般意义上的关系可能由于外来打工妹自身社会经济资源的限制而发生质的变化,建立在择偶的边际性理论和资源缺乏理论基础上的交换意识和务实意识会在一定程度上左右外来打工妹的择偶意愿。

2 资料来源和分析方法

2.1 资料来源

本研究的数据来源于近期在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和湖里区举行的关于流动人口婚恋的问卷调查。该调查的选点没有刻意遵循在概率意义上对厦门市流动人口这一总体的代表性,而是以厦门市政府有关流动人口分布的数据来确定调查的区域,即考虑到流动人口大多数集中在工厂、建筑工地和服务机构等地点,我们就深入这些地方展开调查。该调查共获得有效样本 487 个。根据本研究对调查对象的界定,我们从有效样本中梳理出 298 个未婚流动人口,其中 153 个未婚女性流动人口或外来打工妹就是本文的研究样本,而 145 个未婚男性流动人口则是本研究的对照样本,用来发现择偶意愿的性别差异。

2.2 样本特征

通过对样本的简单结构分析,我们发现流入厦门市的外来打工妹具有以下几个特征:

(1)流出地以福建本省居多,以农村居多,前者占 69.3%,后者为 47.8%。

(2)研究样本平均在外务工时间不到 3 年,其中以 1-4 年和 4-7 年的务工时间为多数;来厦平均务工时间为 2.46 年,其中以 1-4 年的居多,达 43.8%。

(3)研究样本的父母文化程度偏低,但平均都高于参照样本的父母,还有父母间的教育程度差反映了传统的“男高女低”的婚配文化。

(4)年龄结构年轻化,一半的研究样本人口年龄小于 20 岁,平均年龄为 20.06 岁,约比参照样本小 3 岁。

(5)受教育程度比较高,基本上都具有初中及以上的教育水平,但是接受高等教育的比例比较低,只有不到 6% 的外来打工妹得到大学及以上的高等教育。

(6)职业性质以生产、运输业和商业、服务业居多,但从事商业服务业的比例高出男性近 21 个百分点。

(7)月收入水平偏低,其中月收入低于 700 元的占 26.1%,比男性样本高出 15.7 个百分点,平均月收入只有 826 元,比男性流动人口低近 200 元。

(8)大约 55% 的外来打工妹有过恋爱经历,但该比例明显低于外来打工仔。

2.3 变量测量

2.3.1 因变量的处理

如上所述,本研究要解释的外来打工妹择偶意愿包括四个侧面,即择偶态度、择偶标准、择偶时间和择偶途径。在问卷中,我们用两个问题了解外来打工妹的择偶态度,一是要不要择偶或结婚,二是为什么要结婚或结婚的目的是什么。前者是(0,1)分布的虚拟变量,要择偶结婚的为 1,否则为 0。后者为多选题,共有十

个选项,每个选项都是(0,1)分布的虚拟变量,我们的处理方式是,从十个选项中挑选代表个人爱情追求的“相亲相爱”、代表传统婚姻安排的“人生必然过程”、以及代表经济利益偏好的“改善生活条件”分别建立回归模型进行影响因素分析。

在择偶时间方面,我们在问卷中问了两个问题,即“您认为几岁恋爱最合适?”和“您认为几岁结婚最理想?”这两个问题的选答结果都是连续的数量指标。我们将建立一般的多元回归模型来解释被调查对象的选择。

有关择偶标准,我们用“您择偶时,主要考虑对方哪几个方面的条件”来提问,也是一个多选项问题,共有七个选项,每个选项都是(0,1)分布的虚拟变量。我们从七个选项中挑选“物质条件”、“社会关系”和“政治面貌”选项,分别代表“经济”、“社会”和“政治”三种择偶取向来建立多元回归解释模型。

最后,我们在问卷中用一个问题了解外来打工妹的择偶途径,即“您希望通过哪种方式认识对方?”这个问题主要反映外来打工妹在择偶方式上有多大的自主性,我们把“自己认识”的选项赋值为1,其他选项赋值为0,处理成(0,1)分布的虚拟变量,再建立回归模型加以分析。

2.3.2 自变量的处理

本研究一共选用10个解释变量,其中反映社会文化作用的变量3个,表现家庭影响的2个,其余的5个是个人变量。社会解释因素分别是体现“流出地地域文化”和“异地流动状况”的“流出地类型”、“来厦门前出外打工经历”和“在厦门务工时间”等3个变量。“流出地类型”处理为(0,1)分布的虚拟变量,从城镇流出的为1,来自农村的为0。“来厦门前出外打工经历”也处理成(0,1)分布的虚拟变量,来厦门前有出外打工经历的为1,否则为0。“在厦门务工时间”以在厦门的实际停留时间计算,是一个连续的数量变数。

家庭解释因素有两个,分别是“父亲的受教育程度”和“母亲的受教育程度”,都处理为连续数量变数。

选用的5个人解释变量分别是年龄、受教育程度、职业性质、月收入 and 初恋经历等,其中年龄、教育程度和月收入是连续的数量变数,其余的处理为(0,1)分布的虚拟变量。

2.4 分析方法

本文采用的是SPSS10.0统计软件来进行数据处理和模型估计。根据本文的研究需要和被解释因素的统计性质,我们将采用下列三种分析方法,即对比分析法、一般回归和logistic回归分析方法。

首先,我们通过性别比较,既对研究样本进行描述分析,又揭示外来打工妹在择偶态度、择偶标准、择偶时间和择偶途径等方面的性别特点。

其次,由于择偶意愿的时间侧面,即被调查者对“您认为几岁恋爱最合适?”和“您认为几岁结婚最理想?”的选答都是数量变数,我们将利用一般或常规的多元回归方法来加以统计估计,以揭示所选用的各种自变量对外来打工妹择偶时间的影响性质和程度。

最后,考虑到择偶意愿的其他侧面都是用(0,1)分布的虚拟变量来测量,我们将利用相应的logistic回归分析方法估计模型的实际统计值,以验证前面所提出的各个理论假设是否成立。

3 外来打工妹择偶意愿的描述分析

在性别比较中所展开的描述分析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比较完整的关于外来打工妹择偶意愿的多景图,揭示出了几个比较明显的性别特点:

(1)外来打工妹对婚姻没有表现出应有的积极态度,不婚意愿在我们外来打工妹中增长,或者不想结婚的外来女工人数在增加是一个不争的社会事实。从具体的数据来看,大约平均每十个外来打工妹当中,就有3个表示不想结婚。

(2)在择偶动机上,外来打工妹要比外来打工仔更加现代取向和淡化传统追求,除不到10%的被调查对象还希望通过婚姻来改善生活条件以外,她们基本上没有从生育功能和性功能方面考虑个人大事,更没有想以择偶为手段来提升自己的社会地位。但是,她们当中还有一些人把婚姻当作人生的一个必然过程,而且还呈现出较明显的从众心理和行为方式。

表 1 外来打工妹择偶态度的 Logistic 回归分析结果

项目	择偶意愿		择偶动机					
			相亲相爱		改善生活条件		人生必然过程	
	B	Sig	B	Sig	B	Sig	B	Sig
社会解释因素								
城市	-.224	.702	-.517	.331	.159	.865	.128	.833
镇	-.204	.704	-.937	.088	-1.772	.143	.249	.666
外出经历	.082	.884	.172	.750	1.190	.239	.231	.713
来厦月份	.032	.051	.011	.387	.003	.914	.019	.198
家庭解释因素								
父亲教育	-.079	.291	-.066	.384	-.044	.722	-.046	.600
母亲教育	.135	.050*	.165	.016*	-.216	.060	.088	.232
个人解释因素								
年龄	.231	.113	.148	.238	.070	.754	-.034	.819
个人文化	-.016	.902	-.005	.967	.571	.048*	.370	.024*
职业性质	.329	.482	.548	.203	.998	.237	.406	.418
收入	.000	.837	.000	.658	-.003	.166	.001	.509
恋爱经历							-.170	.773
Model Chi-Square	24.242		16.700		11.563		12.489	
正确预测率	71.0%		71.8%		90.2%		67.4%	

*, **, *** 分别表示在 0.05, 0.01, 0.001 水平上具有统计显著性, 下同。

表 2 外来打工妹择偶时间的多元回归分析结果

项目	恋爱时间			结婚时间		
	B	Beta	Sig	B	Beta	Sig
社会解释因素						
城市	-.739	-.131	.211	.098	.020	.853
镇	.506	.097	.348	.085	.019	.860
外出经历	-.149	-.028	.794	.455	.098	.367
来厦月份	-.012	-.132	.389	-.014	-.187	.256
家庭解释因素						
父亲教育	-.046	-.070	.567	.004	.007	.952
母亲教育	.047	.085	.511	.005	.011	.932
个人解释因素						
年龄	.365	.449	.010***	.507	.688	.00***
个人文化	-.089	-.071	.507	.198	.174	.157
职业性质	.524	.110	.267	.713	.173	.101
收入	.002	.218	.082	-.001	-.065	.583
恋爱经历	-2.069	-.386	.00***	-.719	-.155	.149
R-Square	0.330			0.344		
F	3.449			3.433		

三个择偶动机(即代表个人爱情追求的“相亲相爱”、代表经济利益偏好的“改善生活条件”以及代表传统婚姻安排的“人生必然过程”);关于择偶时间的有两个,它们分别是期望恋爱时间和结婚时间;关于择偶标准有三个,它们分别是被调查者对未来对象所具备的经济(物质条件)、社会(社会关系)和政治(政治面貌)条件的重视程度;以及关于择偶途径的只有一个,即是否自我结识。

所选用的解释变量是前面提到的分别处于社会、家庭和个人层面的影响因素,特别要提到的是,为了提

(3)在择偶时间上,外来打工妹的选择分布比较集中,期望恋爱时间和结婚时间主要落在 20-23 和 24-27 岁之间。平均的期望恋爱时间为 21 岁,与外来未婚男性持平;平均的期望结婚时间为 25 岁,比外来未婚男性小一岁半,都显示出比较明显的推迟趋势。

(4)在择偶标准上,外来打工妹更加注重对方的个人品质和所拥有的社会资本,传统的择偶倾向,特别是对学历背景和政治面貌的偏好,都有很大程度的淡化。

(5)在择偶途径上,推崇自主择偶的比例高达 87.6%,但由于自身经济社会背景的限制,外来打工妹的择偶方式具有较为明显的单一性。

4 外来打工妹择偶意愿的解释分析

在这里,我们一共要估计和验证十个回归模型,其中关于择偶态度的有四个,它们分别是一个择偶意愿(即要不要结婚)和三

高拟合效果,我们并没有把所有解释变量都投放到十个模型中去。表1至表3是我们整理出来的拟合结果,其中表1是择偶态度的估计结果,表2是对择偶时间的统计测算,而表3则集中反映对择偶标准和途径的实证检验。下面我们将从整个模型的拟合效果、个体变量的影响性质和程度、以及检验结果的总体评价三个方面对这些结果进行分析。

表3 外来打工妹择偶标准与途径的 Logistic 回归分析结果

项目	择偶途径		择偶条件					
			物质条件		社会关系		政治面貌	
	B	Sig	B	Sig	B	Sig	B	Sig
社会解释因素								
城市	-.182	.805	-.199	.750	.123	.813	-1.008	.153
镇	1.586	.172	-.083	.882	-.895	.079	-1.088	.114
外出经历	-.176	.821	-.017	.977	.731	.166	.244	.711
来厦月份	.007	.690	.021	.158	.001	.943	.010	.521
家庭解释因素								
父亲教育	.087	.424	.012	.882	.064	.357	-.113	.240
母亲教育	-.084	.415	-.069	.338	.124	.041*	.172	.049*
个人解释因素								
年龄	-.182	.275	-.310	.044*	-.046	.708	-.091	.561
个人文化	.370	.032*	.142	.335	.033	.785	-.162	.292
职业性质	-.189	.765	.297	.545	.042	.919	.407	.435
收入	-.001	.673	.002	.157	.000	.632	.001	.584
恋爱经历	-	-	-.570	.299	-	-	.287	.641
Model Chi-Square	12.463		9.079		18.049		9.952	
正确预测率	89.5%		62.0%		67.7%		71.7%	

4.1 模型的拟合效果

在8个 Logistic 回归模型中,拟合效果最好的为择偶的经济动机模型,其正确预测率高达 90.2%,最低的是择偶的物质条件模型,其正确预测率也达到 62.0%;另外,正确预测率在 70%以上的模型有 5 个(见表 1 和表 3)。

两个多元回归模型的拟合效果也不错,它们的 R 平方值分别达到 33%和 34.4%,也就是说恋爱时间模型解释了 33%的被解释变量的方差,以及婚姻时间

模型解释了 34.4%的被解释变量的方差(见表 2)。因此,从拟合的效果来看,这些模型的预测能力还是比较强的,或者换句话说,本文的理论建构还是比较符合所研究的外来打工妹的择偶意愿。

4.2 解释变量的影响性质和程度

从几个表所展示的数据来看,虽然不是所有被选用的解释变量的影响都具有统计的显著性,但是,有几个重要解释变量的作用及其作用的方向还是和前面的理论假设基本上相一致的。

首先,作为表示流入城市再社会化作用最重要的变量,来厦打工的时间长度确实对择偶意愿有着基本显著的影响(在 .051 的统计水平上),而且正如我们所假设的一样,是一种正向影响,即在厦的时间越长,对结婚的积极性越低。

其次,与父亲的教育相比,母亲的教育程度高低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外出打工女儿的择偶意愿,它在女儿的择偶愿望、择偶的爱情动机、择偶的社会条件和择偶的政治条件等四个模型中的影响都具有统计显著性,具体地说,母亲文化水平越高,外出打工女儿的择偶愿望越弱,择偶的爱情取向越明显,以及对未来对象的社会资本和政治身份的要求也越高,基本上与我们前面提出的理论假设相符。

最后,在个人解释因素中,教育背景、岁数大小和恋爱经历都起到一定的作用。外来打工妹的个人文化水平对择偶的经济动机、接受传统的婚姻安排(即把婚姻作为生命周期的一个必然过程)、以及择偶途径都有显著的影响,文化水平越高的外来打工妹,越会注意择偶是否带来生活条件的改善,越会把婚姻看作人生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或不可或缺的经历,越会采取自我结识的办法去寻觅意中人。很显然,前两种的影响关系是和我们通常的理解不相符的。但是,考虑到她们具体的生存状态和环境,我们又会觉得这些选择其实是比较合理的。外来打工妹文化水平的提高可能一方面会强化她们想过更好生活的愿望,另一方面又会增加她们在城市婚姻市场的价格,最后致使她们在择偶时加入更多的经济需求,也把可以带来情感和经济福利

的婚姻生活纳入人生的过程。外来打工妹的年龄和择偶的时间偏好、还有择偶的物资条件的关系密切, 年龄越大的外来打工妹, 所期望的恋爱时间和结婚时间越晚, 对对方的物质条件越不讲究, 这些关系和我们提出的理论假想不吻合。也许, 年龄比较大的外来打工妹会对婚姻有更多的理性思考, 相应的也会推迟她们恋爱发生的时间和实际进入婚姻关系的时期, 加上年龄比较大的女性相对来说拥有较多的社会经济资源的积累, 结果还会使年龄比较大的外来女性不会太在意对方的经济状况。而对于年龄比较小的外来打工妹来说, 恋爱排除孤独、寻求情感慰藉和增加社会经济扶助的效用则显得相对比较重要, 期望早点恋爱, 期望和经济条件比较好的对象牵手, 自然成为她们择偶意愿的一种比较明显的倾向。

与我们的假设相一致, 外来打工妹的恋爱经历对她们的期望恋爱时间有着相当显著的负面影响, 即相对于没有恋爱经历的姐妹, 有过感情交往的外来打工妹越期望推迟择偶结婚的时间。

4.3 实证检验的总体评价

以上的结果分析表明, 本文所建构的大多数理论模型都具有比较满意的解释能力, 对深入理解外来打工妹的择偶意愿是有帮助的。当然, 鉴于有 3 个模型的正确预测率水平还低于 70%, 我们还必须增加更合适的有关再社会化和边缘化的变量, 以进一步改善这些模型的拟合程度。

在本文选用的 10 个解释变量中, 有一半解释因素的影响具有统计的显著性。相对比来说, 母亲文化程度的作用是最大的, 它对外来打工妹的 4 个被解释择偶变量的影响都通过了显著性检验, 母亲教育程度与外来打工妹择偶意愿现代化之间的正向关系再一次得到证实。这主要是由母亲在家庭教育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所决定的。由于我国传统家庭制度和性别文化的安排, 未婚子女特别是女儿与母亲生活在一起的时间最长, 彼此之间的互动既是经常性的又是全方位的, 因此受母亲的代际影响也是最大的最深刻的, 甚至由于对母爱的感恩也会按照母亲的意愿去生活着。母亲通过较好的公共文化教育所形成的先进婚恋观, 会通过她与女儿的交谈、对别人的评论, 以及自己的身体力行, 直接或间接地传递给女儿, 从而影响着女儿婚恋观念的最初形成, 并指导女儿随后的择偶实践。从这个意义上来说, 提高农村女性的文化程度不仅对她们自己的择偶观念更新有好处, 而且还会惠及她们的孩子, 去建构一个与时代同步的婚恋模式。

外来打工妹的文化程度和年龄对她们择偶意愿的影响并列第二位, 都对择偶意愿的三个因变量具有显著的解釋力。一般来讲, 女性的文化程度越高, 越有利于她们形成强调爱情的新型择偶观, 这主要是因为较高的文化程度赋予了她们较强的认识和接受先进婚恋观念的能力, 同时又削弱农村传统婚恋文化所产生的负面影响。但是, 外来打工妹的身份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文化水平对择偶观念现代化的正面影响, 我们在看到文化程度增强外来打工妹在择偶方面的自主意识的同时, 还发现教育水平比较高的外来打工妹更希望早日摆脱资源缺乏和经济生活相对拮据的状况, 并把择偶和联姻作为尽快致富的手段之一, 使自己婚姻添加了不少功利的色彩。外来打工妹的年龄和择偶模式的实证关系更有力地支持我们所提出的边缘化择偶理论。越年轻的外来打工妹, 不仅越希望早恋早婚, 而且还越期待与一个经济条件优越的对象建立婚恋关系, 以便从婚恋中走出一条脱贫的路子。

来厦务工的年限对择偶意愿的正面影响在一定程度上证实再社会化的择偶假想, 即在城市打工就意味着要受到城市生活方式和思想观念的影响, 而打工时间的长短往往意味着传统观念与现代观念的此消彼长, 潜移默化地转变着外来打工妹的择偶观。然而, 这个变量只对一个被解释的择偶变量产生显著影响的事实又告诉我们, 流入城市对外来打工妹择偶观念和行为的再社会化作用其实还受到很多因素的限制, 如语言习俗、居住方式、交友圈子甚至来自同一个流出地的人口规模等都会在一定程度上制约再社会化的进程。例如, 由于社会网络的限制, 即外来打工妹的社会网络多以“强关系”为主, 无论是职业介绍, 还是工作、生活和社会交往, 都局限在一个以地缘和血缘为纽带的老乡圈子里。而且她们来到城市以后, 首当其冲的生存压力迫使她们必须集中精力打工挣钱, 高强度和严重延时的劳动减少了她们的闲暇时间, 有限的收入又让她们无法开展更多的社交活动和拓宽与常住人口的交往范围, 所有这些因素综合起来都可能降低城市的再社会化影响。从这个意义上来说, 只用一个在流入城市停留的时间来作为再社会化的测量指标明显是不够的。当

然,我们也可以得出另外一种解释,即由于新生代的外来打工妹对城市文化不仅认同的速度快而且认同的程度深,致使她们在观念上趋同于那些富有流动经历、深受城市文化影响的“老”流动姐妹,进而削弱了流动经历与择偶观念现代化之间的因果关系。

5 结论与启示

本文利用问卷抽样调查资料,从择偶态度、择偶时间、择偶标准和择偶途径四个侧面,描述和发现外来打工妹的择偶意愿及其主要特点,并通过多元回归估计,检验我们所提出的关于外来打工妹择偶意愿的两个理论,即再社会化理论和边缘化理论。实证结果基本上支持我们的两大理论假设,表明流入城市对外来打工妹的择偶观和择偶模式起到一定的再社会化作用,她们在农村形成的传统择偶意识发生了比较明显的进步;与此同时,由于她们在流入城市的边缘性地位,以及由此产生的生存压力,使得她们不得不把婚恋演变为一种尽快从经济上脱贫致富、从精神上排解孤独的工具,使自己的婚恋变迁呈现出“二元”并存的状态,即交织着爱情与功利、自我与从众的综合变化。在城乡流动中走过来的外来打工妹再也不是原来的农家姑娘,她们的婚恋观已经打上了都市的印记。

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特区和沿海城市的外来打工妹数量与时俱增,她们在为流入地区经济发展做出贡献的同时,也因为自己的特殊身份和人生安排而面临许多个人的婚恋问题。我们认为,流入城市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去关心和帮助我们外来打工妹的婚恋实践:一是从文化和政策两个方面消除对外来打工妹的歧视,使她们在享受市民待遇的同时,真正和城市居民融为一体;二是为外来打工妹提供更多继续教育的机会和资源,引导她们进一步提高文化水平,并把知识转化为在城市生存和发展的能力,实现教育和婚恋之间的积极互动;三是把当地的商业性婚介机构变为社会公益事业,以及整合工青妇的资源,通过开展适合外来打工妹的各种社会活动,为她们搭建鹊桥,拓宽交友范围,以便适时地、有质量地解决好她们的婚姻大事。

参考文献:

- Cutentag M. and P. Secord 1983 "Too Many Women Sex Ratio Question", Beverly Hill Sage
- Stephen E. H. And F. D. Bean 1992 "Assimilation, disruption and the fertility of Mexican-origin women in the United States"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Review* 26(1): 67-88
- Swicegood G. C., et al., 1988 "Language usage and fertility in the Mexican-origin popula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Demography* 25(1): 17-33
- Halli S. S. 1987. *How Minority Status Affects Fertility: Asian Groups in Canada* New York: Greenwood Press
- Strong B. And C. DeVault 1986 *The Marriage and Family Experience* West Publishing Company
- Kahn J. R. 1988 "Immigrant selectivity and fertility adapt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Social Forces* 67(1): 108-128
- 谭晓青. 中国人口迁移与生育率, *人口研究*, 1990(4).
- 潘贵玉(主编). *婚育观念通论* [M]. 北京: 中国人口出版社, 2003. 246-323
- 中国社会科学院网. 张翼: 流动人口的婚姻与择偶趋势, [JOL]. <http://www.cass.net.cn/file/2005070533277.htm>
- 彭希哲. 先进生育文化的扩散: 城市生育文化对进城流动人口的影响 [A]. *全国生育文化理论与实践研讨会论文集* [C]. 北京: 中国人口出版社, 2003
- 徐爱光等. 浙江迁入女性人口婚姻生育调查 [J]. *中国人口科学*, 1992(4).
- 黄润龙等. 女性流动人口婚姻状况及影响因素研究 [J]. *南京人口管理干部学院学报*, 2000(1).
- 陈印陶. 打工妹的婚恋观念及其困扰: 来自广东省的调查报告 [J]. *人口研究*, 1997(3).
- 林富得、张铁军. 京城外来女的婚育模式 [J]. *人口与经济*, 1998(2).
- 宋国臣、顾朝林. 北京流动人口的家庭规模及其形成因素 [J]. *人文地理*, 1999(2).
- 郑真真. 外出经历对农村妇女初婚年龄的影响 [J]. *中国人口科学*, 2002(2).
- 郑真真. 人口流动对农村妇女生育观念与行为的影响 [A]. *全国生育文化理论与实践研讨会论文集* [C]. 北京: 中国人口出版社, 2003

(下转第 61 页)

入贫困(表 7), 例如, 在总体中, 参加医疗保险者占总体的比例是 36.5%, 在贫困人口中, 只有 4.8% 的人能够享受医疗保险。

表 6 不同人口群体的健康状况和贫困发生率(%)

健康状况	总体	非贫困人口	贫困人口	贫困发生率
不健康	2.2	2.0	3.2	12.90
一般	19.2	18.6	26.4	11.91
比较健康	24.1	23.6	28.8	10.37
健康	39.3	39.8	33.6	7.42
很健康	15.2	16.0	8.0	4.57

表 7 不同人口群体中享受医疗保险和其它保障的人员占相应总体的比例(%)

类别	退休金	医疗保险	失业	无任何福利
总体	29.0	36.5	10.6	55.0
非贫困人口	31.3	39.5	11.2	51.8
贫困人口	4.0	4.8	4.0	90.4

4 结论和建议

从上述对数据的描述和分析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第一, 就男性和女性相比较而言, 女性更可能受贫困的袭击而沦为贫困, 由于我国现阶段的贫困与就业状态关系密切, 因此, 女性更易陷入贫困这一事实较大程度上与男女两性的就业环境有关。由于各种原因的总和, 如男女两性人力资本存量的差异、在家庭中的不同分工、受经济结构调整的不同冲击以及劳动力市场上存在的一定程度的歧视等造成女性面临的就业环境更加不利, 因而更易陷入贫困。

第二, 贫困的发生具有明显的年龄特征, 劳动年龄的两端是贫困发生率最高的区域, 具体说来是 22 岁以下的人口和 45 - 49 岁组的人口最易陷入贫困, 劳动黄金年龄组的人口贫困发生率最低。

第三, 个人人力资本的存量对贫困有显著影响,

数据分析表明, 受教育状况和健康状况较差的人更容易受贫困的袭击, 而学历较高者和健康状况良好者则不易陷入贫困, 受教育状况越好, 贫困发生率越低。

上述特征也同时反映了我国城镇地区的贫困与就业之间的高度相关性, 有一个相对稳定的工作, 一般情况下便可以避开贫困的困扰。相对来说, 女性、劳动年龄两端的人、学历较低者和健康状况不佳者之所以易陷入贫困, 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上述特征和相关的个人特征使他们在劳动力市场上缺乏竞争力, 容易失业或者是难以找到既能要求较高、收入较高的工作, 因而容易沦为贫困。

针对这种情况, 在我国, 为了从根本上缓解贫困, 除了健全和完善当前的社会保障制度外, 关键仍然在于针对不同人口群体的特征, 通过各种渠道促进就业和再就业, 就业是最好的保障, 提高人们在劳动力市场上的竞争能力和就业能力是摆脱贫困的最长远、最根本的方法; 扩大就业, 实现更高的再就业率, 是治理城市贫困和帮助穷人的最有效措施。同时, 就业能力的高低和个人的技能水平存在密切联系, 因此, 通过建立和完善多层次、多渠道的职业培训体系, 提高弱势群体的竞争能力, 是提高他们就业率的关键, 故应成为城市扶贫政策的重点。

参考文献:

- 蔡 . 中国人口与劳动问题报告 No. 4(2003): 转轨中的城市贫困问题(人口与劳动绿皮书) [R].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3.
- 迪帕·纳拉扬等. 呼唤变革 [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3.

[责任编辑: 陈功]

(上接第 40 页)

叶文振、叶妍. 流动人口的择偶模式及其影响因素——以厦门市流动人口为例 [J]. 人口学刊, 2005 (3): 46 - 52

迟书君. 深圳流动人口婚姻家庭状况调查报告 [J]. 青年研究, 2005 (11): 33 - 42

张继焦. 外出打工者对家庭和社会的影响: 以贵州为例 [J]. 民族研究, 2000 (6)

周伟文、严晓萍、刘中一. 生存在边缘——流动家庭 [M]. 石家庄: 河北人民出版社, 2002. 132 - 133

中国大百科全书总编辑委员会《社会学》编辑委员会. 中国大百科全书·社会学 [Z]. 北京: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91. 6

[责任编辑: 乔晓春]